

改革

张维迎◎主编



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人民出版社

改革

张维迎◎主编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改革 / 张维迎主编.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3
ISBN 978-7-208-11302-2

I. ①改… II. ①张 III. ①中国经济—经济改革—
研究 IV. ①F1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3) 第 045936 号

责任编辑 文 青
装帧设计 水玉银文化



改革
张维迎 主编

出 版 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193号 www.ewen.cc)
出 品 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世纪文景文化传播有限责任公司
(100013 北京朝阳区东土城路8号林达大厦A座4A)
发 行 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发行中心
印 刷 北京鹏润伟业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00×1020毫米 1/16
印 张 21.5
插 页 2
字 数 224,000
版 次 2013年5月第1版
印 次 2013年5月第1次印刷
I S B N 978-7-208-11302-2/F·2162
定 价 45.00元

新版序言：未来十年是改革的窗口期（张维迎） 1

序言：理解中国经济改革（张维迎） 9

开篇：改革的核心是制度创新（成思危） 21

• 上篇 •

吴敬琏

演讲：中国经济的高速成长怎样才能持续 36

延伸：增长模式与技术进步 53

茅于軾

演讲：从制度演变看改革以来财富的创造 86

延伸：从财富创造和财富分配看经济 94

厉以宁

演讲：城乡二元体制改革中的十个问题 106

延伸：我国经济和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113

对话一：中国改革的成功与不足
（吴敬琏、厉以宁、茅于軾） 126

• 下篇 •

林毅夫

演讲：渐进改革的逻辑 150

延伸：发展与转型——思潮、战略和自生能力 161

周其仁

演讲：重新界定产权之路 179

延伸：大方向不能错 188

钱颖一

演讲：从国际比较看中国经济 194

延伸：市场与法治 208

陈志武

演讲：改革开放160年 235

延伸：对“中国奇迹”与改革路径的再思考 247

樊 纲

演讲：经济改革仍需“挖潜” 267

延伸：对体制改革若干问题的思考 276

张维迎

演讲：市场化改革与收入分配 291

延伸：理性思考中国改革 308

对话二：寻求进一步改革的动力

(张维迎、钱颖一、林毅夫、周其仁、陈志武、樊纲) 329

未来十年是改革的窗口期

张维迎

(一)

从 1978 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算起，邓小平发起的中国改革开放已进入第 35 个年头。

35 年的改革开放波澜壮阔。刚刚过去的 10 年，或许是最不寻常的 10 年，从不同角度可以得出完全不同甚至相反的评价。我的一个基本评价是：从经济增长的指标看，它是最好的 10 年；从社会矛盾的角度看，它是糟糕的 10 年；从改革的角度看，它是失去的 10 年。

这 10 年间（2003~2012 年），中国的 GDP 保持了年平均 10% 以上的增长率；中国经济总量在世界上的排名从第 6 位（2002 年）上升到第 2 位（2010 年）；进出口贸易年平均增长率达 20%；中国已成为世界第二大贸易国、第一大出口国；国家外汇储备从 2002 年的

2 864 多亿美元上升到 2012 年的 33 100 亿美元，占到全球外汇储备的三分之一；在全球金融危机期间，中国经济仍然保持了高速增长，成为全球增长的主要引擎。无疑，10 年间，民众的生活水平也有了显著的提高。

但在经济高速增长的同时，这 10 年间，中国的各种社会矛盾也日益突出，腐败现象愈演愈烈。从官员腐败发展到“全民腐败”，官商勾结、买官卖官大有失控之势；收入分配不公、机会不均等日益严重，越来越多的大学毕业生青睐政府职位就是一个佐证；官民对抗，民众对政府信任度越来越低，群体性事件越来越多，维稳费用越来越高；私有产权得不到有效保护，企业家群体缺乏安全感，移民海外人数越来越多；社会信任度下降，道德危机比生态危机更为严重。10 年前政府提出建立“和谐社会”的目标，但一个无可争辩的事实是，与 10 年前相比，今天的社会更不和谐了，很难找到一个对现实满意的人群。

在改革方面，这 10 年倒退多于进步。经济体制由“国退民进”转向“国进民退”，国有垄断企业越来越强势，民营企业受到越来越多的挤压，国务院关于发展民营企业的“36 条”政策一直得不到真正落实；政府直接投资越来越多，政府权力越来越大，对微观经济的干预也越来越多，市场竞争越来越不公平，企业越来越离不开政府；法治精神退化，以“维稳”代替法治，政治权力干预司法和主导法院判决的情况变得更为严重，人们期待的政治体制改革没有丝毫进展。

为什么在体制改革停滞甚至倒退的情况下，过去 10 年中国经济仍然保持了高增长？一些人把这一现象解释为“中国模式”的成功。所谓“中国模式”，最重要的特征是政府对经济的控制和国有垄断

企业对市场的主导。我的看法是，过去 10 年的高增长并不是“中国模式”的成功，而是来源于之前 25 年的改革红利。这些改革红利包括：国有企业在竞争性领域的退出（发生在 20 世纪 90 年代），民营企业家的崛起，银行系统呆坏账的处理，外资企业的进入，加入世贸组织（WTO），等等。没有这些之前的改革所创造的改革红利，过去 10 年的高增长是不可想像的。比如说，如果没有在 2001 年进入 WTO，中国的贸易出口额怎么可能在过去 10 年增长 5 倍多，从 2002 年的 3 256 亿美元增加到 2012 年的 20 498 亿美元？如果没有出口的高增长，怎么可能有 GDP 年平均 10% 的高增长？加入 WTO 不仅对经济的高增长做出了直接贡献，也通过阻止体制的倒退为经济的高增长做出了间接贡献。如果没有加入 WTO，过去 10 年体制的倒退会更为严重！

另一方面，过去 10 年里中国社会之所以越来越不和谐，一个重要原因是改革的停滞和倒退。当政府的权力越来越大，竞争环境越来越不公平的时候，腐败一定越来越严重，收入分配一定不可能趋向公平。在一个不公平的社会里，每个人的怨气就会越来越大，我们也不可能指望人们会有很好的道德水准。

为什么过去 10 年会出现改革的停滞和倒退？因为我们的理念变了，我们也缺少了真正具有改革精神的领导力。我们从“发展是硬道理”转向“稳定压倒一切”，从注重财富的创造转向注重财富的分配，从相信市场的力量转向迷信政府的权威，从相信民营企业家的创造力转向依靠国有企业的垄断力，从相信法治转向相信控制。这样的理念转变，使整个国家的气质发生变化，自然会导致市场化进程的停滞。失去了改革的理念，既得利益者就获得了操纵政策的自由，设租和寻租活动就变得猖狂起来，市场化进程就开始倒退。

以我的判断，过去 10 年的高增长已经几乎耗尽了前 25 年所积累的改革红利。伴随人口红利的消失和金融危机之后国际市场的变化，中国的经济增长速度本身就有个向下调整的过程，中国的增长方式需要转型。如果不能重新启动市场化导向的经济改革，并开始以建立宪政体制为中心的政治体制改革，增长转型不可能成功，未来 10 年中国经济要达到 7% 的增长率也是非常困难的。如果增长速度掉下来了，中国的社会矛盾也会更加突出，社会稳定将更难维持。

(二)

无论是进行增长方式转型，还是解决我们面临的社会矛盾，改革是我们的惟一出路，这在今天已成为普遍的共识。但改革是否会重新走上正确的轨道，还依赖于有理念、有魄力的领导力。

悲观主义者认为，改革就要触动既得利益，但既得利益者就是现在有权势的人，他们怎么可能有积极性改革呢？但是，历史上的好多变革都是既得利益者推动的，而且好多成功的变革都是既得利益者所为。

既得利益者为什么推动变革？我总结有三个原因：

第一，理念的力量。我们不要以为人的行为都是受利益支配的。大卫·休谟（David Hume）在两百多年前就讲过，尽管人是由利益支配的，但利益本身以及人类的所有事务，是由观念支配的。纵观历史，几乎所有伟大的变革都是由观念的变化引起的。也就是说，你有什么信仰，这非常重要。当年共产党的创始人和领袖主要是旧体制下“既得利益”家庭出生的人。不要以为他们是被压迫阶级，所以才革命，不是这么回事。他们闹革命是因为他们接受了马克思列

守主义，有了新的理念。法国大革命的好多推动者也是贵族，废除贵族的大革命是贵族努力的结果。受到威胁的精英们在困境中产生了一种新思想，它为大革命提供了灵感。所以我觉得理念非常重要。

第二，既得利益者并非统一的利益体。人们一讲既得利益者，就好像他们团结得像一个人一样，有一个明确的目标函数，可以统一行动。没有的。有时统治者之间的矛盾比他们与被统治者之间的矛盾大得多，他们在危机的时候有可能会形成一些共识，但并不是所有人都能看到危机。从欧洲，特别是英国的历史来看，统治集团内部的斗争是非常激烈的，法治和民主首先是在贵族内部实现的，然后才逐步推广到全社会。贵族内部为什么要建宪政和民主？就是因为旧体制下他们相互之间打得不可开交，每个人都有特权，但都没人权，互相伤害，最后认识到法治的重要性，妥协的重要性，这就导致了宪政的出现。英国 19 世纪之前的变革，主要是贵族跟国王、教会之间，以及贵族相互之间斗争的结果。

第三，改革是既得利益者避免革命的最好办法。被统治阶级有了利益诉求你不能满足，他们就可能起来推翻你。好在统治阶级内部可能有人认识到这一点，所以就不断地满足被统治阶级的需要。他们做起来可能勉勉强强，但不管怎样，还是做了。英国从 1832 年第一次改革法案开始，为什么不断扩大选举范围，最后到 1928 年实行了男女平等的普选权？就是英国统治阶级清楚地认识到，如果不改革会爆发革命。

总而言之，我讲的是，既得利益者有可能变成改革者。如果我们不承认这一点，以为所有的变革都是你死我活，人类是没有希望的。你死我活的革命后果也是不可预料的，也不一定比原来好。

这是从乐观的角度讲。从悲观的角度讲，既得利益者是否真的

能变成推动改革的力量，我还没有完全的把握。我们体制的危机在哪儿？它不是那么能有效运转。一些党政部门，嘴上说的好像跟上面一样，但做的完全不一样。一些号称维护党的领导的机构和官员，做的许多事情都在削弱党的领导。这些人口口声声说是对党负责，实际上只是保自己的乌纱帽而已。现在的腐败分子就是在挤兑共产党，像储户竞相提款挤兑银行一样。

或许，最为重要的问题是，我们这个社会已经走到了政治家只能出自官僚的层面。政治家和官僚本来是两类人，我们现在成了一类人。你看我们的最高领导人也是公务员，我们的法院院长也是公务员。这是很荒唐的。官僚是按部就班不做错事，政治家是要做正确的事，做关乎国家命运和前途的大事。官僚像职业经理人，政治家要像企业家。政治家要有一定程度的横空出世，要经过一定的磨难，但不是官僚主义的磨难，而是政治竞争的磨难。而我们现在的这个体制，已经到了这一步，政治家只能出自官僚。官僚是经过一步一步循规蹈矩过来的。中国共产党现在自身面临着挑战。全国 13 亿人，实际上是把国家“承包”给了共产党，共产党怎么办？就是怎么选出最好的“董事长”和“总经理”经营这个“公司”。

这个官僚系统培养政治家的办法可怕在哪里？我举个很简单的例子。设想你刚被选拔为一个副县长，你离县委书记中间有几个台阶？5 个！每个台阶至少两年，运气好的话，10 年后你可以当上县委书记。当上县委书记大权独揽，可以干一些大事，但你还要不要进步？要进步就得当副市长，副市长离市委书记也有 5 级，又 10 年。副省长到省委书记又 10 年。这 3 个 10 年过去了，只有两种结果：有理念、有魄力、有棱角的人或者彻底出局，或者已经磨得没有理念、没有棱角了，成了彻底的官僚。结果就是只有官僚领导国家。只有

官僚领导国家就变得很可怕了。

如果我们不需要变革，至少体制上已经走到法治、宪政、民主的层面，那还好办些。问题是我们所处的时代恰恰是需要伟大领导人的时代，而我们这个体制本身不是产生伟大领导人的体制。美国的运气在哪儿？美国的开国元老经过了三四十年轮流执政，比如华盛顿干 8 年，亚当斯干 4 年，杰克逊再干 8 年，麦迪逊又 8 年，这 4 人一共干了 28 年，美国的民主宪政制度就建立起来了。我们的麻烦是第一代革命家有那种权威，但不做那样的事情，邓小平也没有来得及做，把时机错过了，一误就是 60 年。

当然，历史总是有偶然性的，有时候阴差阳错碰到一个人，他也许有很好的理念，有很强的使命感，有胆量、有魄力、有领导力，敢做大事。如果这样，就是国家和民族的幸运。由于特殊的历史原因和家庭背景，新一届领导人有点横空出世的味道，不完全是从一层一层的官僚体制中走出来的。所以我们还是应该有所期待。从这个意义上讲，未来 10 年是中国改革的“窗口期”。错过这个“窗口期”，麻烦就大了，因为以后出伟大政治家的概率就大大降低了。

（三）

改革需要理念先行。而理念的形成，有赖于学者的探讨。

本书第一版以《中国改革 30 年》为书名于 2008 年出版。这次再版，保持了原版的基本结构，但对“推荐阅读”部分重新做了调整，主要从各位作者近几年发表的有关经济改革及未来中国走向的文章中选了一些重要文章，并尽量将每位作者的著作列全，以使有兴趣的读者做更深入的阅读。

5年过去了，随着新一代领导人登上历史舞台，中国或许正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但本书中10位作者提出的有关改革和发展的观点并没有过时。10位作者的观点不尽相同，但发出的都是理性的声音。他们在5年前发出的警告，并非杞人忧天！

改革之路仍然漫长。希望中国不要再失去未来的10年。

2013年3月4日

理解中国经济改革

张维迎

由邓小平发起的中国经济改革已经走过了 30 年的历程。回过头看，30 年前，当改革开始的时候，至少有两件事我们没有预料到：

第一，我们没有预料到改革的路程如此漫长。最初，改革领导人设想大约需要 5~10 年的时间完成改革；即使到 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许多改革者仍然乐观地预期，到 1990 年、最晚到 1995 年，改革应该画上一个句号（所以有“三五八”改革规划）。但 30 年过去了，中国仍然处在改革的过程中，我们仍然不知道改革将终于何时。

第二，我们没有预料到中国的经济发展速度如此之快，改革的成就如此之大。20 世纪 80 年代初，邓小平提出到 2000 年国民收入翻两番的目标，不少人抱有怀疑态度，甚至觉得有些“冒进”。但事实证明，中国经济的发展比邓小平预期的还要快。在过去 30 年里，中国的人均 GDP 每 10 年不到就翻一番。到 2007 年，已达到 2 500 美

元；中国的经济总量在世界上的排名从 1978 年的第 13 位上升到 2007 年的第 4 位；中国进出口占世界贸易的比例从 1978 年的第 23 位上升到 2007 年的第 3 位。当初，我们也不可能预料到 30 年后，人民币汇率会成为国际经济问题；我们更想不到，到 2007 年的时候，世界市值最大的 10 大上市公司有 5 家是中国公司。

在我看来，中国改革的路程如此漫长，改革的成就如此之大，都来自一个共同的原因，就是中国在 30 年的时间里，走了一条以市场化为导向的改革道路。当初，我们不仅没有认识到建立市场经济是如此艰难，更没有认识到市场经济创造财富的威力是如此之大！

要理解中国过去 30 年的经济改革及其成就，我认为有五个转变最关键：

第一，资源配置信号由计划指标转向市场价格。

资源是有限的，社会应该把有限的资源用在什么地方，才能创造出最大的价值？在计划经济下，没有一个合理的标准，完全依赖于计划官员想像中的“社会需要”。比如，改革开放之前，中国最缺少的是轻工业产品。因为计划官员固执地认为，对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来说，最重要的是重工业，所以大量的资源都投向重工业。结果造成消费品的严重短缺，老百姓需要的日常消费品没有一件不靠票证能买得到。

市场经济中，价格是协调经济活动的信号，也是激励人们做出最优选择的机制。价格由产品的社会价值和生产成本决定，反映的是供求关系。改革开放以后，引入了市场，有了价格信号，需求诱发供给，什么样的产品消费者评价最高，资源就被引导到生产什么产品。价格不仅调节资源在不同产品之间的配置，而且调节资源在不同所有制企业之间的配置。记得 20 世纪 80 年代早期，一些重要资源（比如

钢铁等原材料)基本上都是由国家计划配给国有企业。后来,由于乡镇企业和民营企业出现——它们效率更高,愿意支付更高的价格,使这些本来归国有企业使用的资源,通过各种渠道转向它们,用来生产居民最需要的产品。逐渐地,短缺消失了,市场上的产品丰富起来。事实证明,用价格信号引导资源配置,远比国家计划更有利于社会财富的创造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

价格机制是通过双轨制逐步引入的,这是中国经济改革的一个重要特点。双轨制保证了从计划调节到市场调节的平稳过渡,避免了经济的剧烈振荡,由此使得改革与发展并行不悖。双轨制也缓解了改革中的利益冲突,使得中国的改革基本上成为一个帕累托改进,而不是一场剥夺既得利益的革命。

今天,价格信号不仅调节绝大部分产品市场,而且也调节要素市场。中国的劳动力市场是所有要素市场中发展最充分的,市场工资已成为调节人力资源配置的主要信号。如果没有劳动市场的充分发展,就不会有大量的农村劳动力转向工业就业,也就不会有私人企业和外资企业的发展,而后者正是中国经济中最具活力的部门。中国的资本市场和土地市场受政府管制最多,存在的问题也最多。如何减少政府对资本市场和土地市场的干预,让价格机制(利率、地价)更好地发挥作用,使得死的资产变为活的资本,应该是下一步改革的重点。政府还应该避免在劳动力市场上引入过多的政府干预,毁掉来之不易的改革成果。

第二,经济决策的主体由政府官员转向企业家。

现实世界中,任何资源配置都是由人做出的。企业也好,政府也好,本身只是一个组织形态,不会作任何决策,真正作决策的是人。不同的体制下,决策的主体不同。计划经济下的决策主体是政

府官员，市场经济下的决策主体是企业家。企业家队伍的兴起，经济决策的主体由政府官员向企业家的转变，是中国 30 年改革开放的重大变化之一。

企业家作决策的时候，要预测未来，以价格为信号，以利润为目标，要看投入创造的价值能不能超过投入的成本。如果亏损，他就面临破产，所以他的决策指向在多数情况下与创造社会财富的要求是一致的。对市场的预测越准确，企业利润越多，资源配置越合理，创造的社会价值就越大。而官员不同，他们在决策的时候考虑的主要是“政治账”和所谓的“社会账”，而不是经济账。不考虑市场需求，不计成本，不关心利润，即使决策失误，项目亏损，也不影响他们的职位升迁。所以，大量的政府投资变成了无效投资、浪费性投资。事实上，计划经济下政府官员挂在口上的“政治账”、“社会账”，通常不过是他们掩盖决策失误的借口而已。

现在我们仍然处于官员决策和企业家决策并存的阶段。我们经济中存在的很多问题，是经济决策权没有真正从政府官员转到企业家造成的。在很多产业，我们仍然有大量的政府投资。企业投资需要政府审批，政府出台的一些政策直接对企业的经营自由造成损害。政出多门，政策多变，企业家总是忙于应对政策的不确定性……所有这些，都是我们市场化改革没有完成的表现。如果我们能给企业家更多的自由，让价格信号更好地发挥作用，资源配置的效率就会进一步提高，技术进步会更为迅速，腐败现象也可以大大减少。

第三，个人权益基础由政府职位转向私人财产。

计划经济下，个人享有的权益基本上基于其在政府系统中的职位，个人对于社会资源的控制和享受是由其本人或家人的“官位”和“身份”决定的。职位越高，控制权越大，享受也越多。在这样